

# 天津新学书院校园设计及其“剑桥血统”刍议

## ——记一所已逝的近代校园文化遗产

A Historical Survey of Campus Planning and Architecture of 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  
In Memory of a Demolished Modern College

吕博 冯刚 (通讯作者) 张哲浩 卞洪滨

LYU Bo, FENG Gang, ZHANG Zhehao, BIAN Hongbin

**摘要/** 挖掘和整理了天津新学书院校园设计与建设的基本情况, 以此为基础, 比较和分析了其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两校的校园规划思想和建筑艺术特征。总结了“牛桥”校园传统在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期对英国本土及部分海外国家及地区的大学校园建设的影响。

**关键词/** 天津新学书院; 近代大学; 学院哥特; 教会; 剑桥

**ABSTRACT/** Through digging and combing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ampus planning and campus architecture of 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 with comparison of that of St John's College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then reviews the influences of the quadrangles and Gothic architecture from Oxbridge traditional colleges on many universities in the districts of Britain, Northern America and China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19th to the early 20th.

**KEY WORDS/** 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 Modern University; Collegiate Gothic; Church; Cambridge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 英国伦敦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在中国创办了多所统称为“英华书院”的教会学校, 天津新学书院 (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 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所<sup>[1]</sup>。受时任校长赫立德 (Samuel Lavington Hart) 的影响, 新学书院的校园设计参考了赫氏的母校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 (St John's College, Cambridge) 的模式, 建成了具有英国“牛桥”校园特征的“哥特方院”。象征着学术权威的“牛桥”大学校园建筑形式在 19 世纪后半叶至 20 世纪早期对英语世界的大学校园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北美高校中催生了“学院哥特”式校园建筑, 并随着英美殖民者来华办学而引入到部分中国近代大学的校园建设中, 天津新学书院校园即属其中之一。

### 1 天津新学书院建设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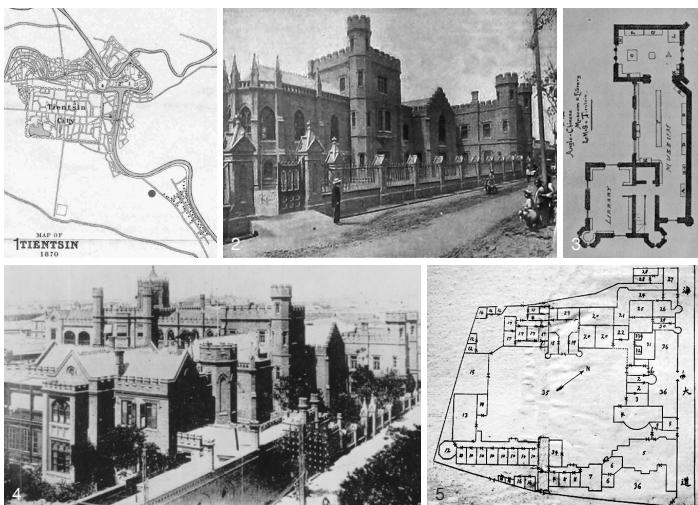
#### 1.1 从养正书院到新学书院

天津新学书院的前身是天津养正书院 (Theological Institute in Tientsin)。该校由伦敦会传教士理一视 (Rev. Jonathan Lees) 于 1860 年代创办, 原是一所培养神职人员的小规模圣经学校。伦敦会在当时于天津老城西南郊外获得了英租界以北、法租界以西、沿海大道 (即大沽路, Takou Road) 两侧的一些地皮。路东的地皮内陆续建有教堂、医院等建筑, 养正书院位于路西地皮内 (图 1)。19 世纪末以

前的在华教会学校, 更多地作为传教活动的附属品而存在, 小规模的教学活动常常直接依附在教堂内展开。规模稍大而独立设置的学校则常与教会的其他建筑 (如教堂、医院等) 彼此靠近地进行建造。伦敦会养正书院的设置亦反映出该特征。养正书院与街对面的伦敦会施医院<sup>[2]</sup>和伦敦会大院合称“三位一体”<sup>[1]</sup>。

养正书院校园于 1896—1898 年间进行了一轮改造。此前于 1892 年来华、曾在武昌从事 3 年传教工作的伦敦会传教士赫立德于同期来到天津, 他个人出资了学校的改造费用<sup>[2]</sup>, 学校的英文名称以其已故兄长之名命名为沃尔福德·赫立德纪念书院 (The Walford Hart Memorial College)。改造后的书院由圣经学校 (Theological Institute) 和男童寄宿学校 (Boy's Boarding School) 两座相连的临街建筑组成 (图 2、3)。

在经历庚子事变期间学校的短期停办后, 伦敦会在重新改组学校的过程中认可了赫立德的主张, 将学校办学方向从圣经教育转向基督教精神引导下的通识高等教育, 以现有养正书院校产为基础创建一所新学书院<sup>[2]20</sup>, 由赫立德出任校长。学校制定了进一步的扩建计划: 修复局部受损的旧有校舍作为学校东楼, 并在学校地皮沿南北两端各新建一座 3 层大楼<sup>[1]478</sup>。学校于 1902 年伴随着北楼的竣工而开学<sup>[3]</sup>, 后于 1910 年底建成南楼, 并在西面建设了占地一亩的体育室。东、北、南 3 座楼的功能带有混合性。北楼和东楼主要



1 1870 年的天津地图，圆点处为养正书院  
2 19 世纪末改建后的养正书院  
3 养正书院内图书馆与博物院平面  
4 1930 年代的新学书院校舍鸟瞰  
5 1930 年代的新学书院校舍平面

容纳着有关教学功能的教室、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有关宗教集会功能的大礼堂、小礼堂，但也有部分房间用作学生宿舍和食堂。南楼主要是学生宿舍，但也设有部分实验室、图书室和实习车间。校园东南首建有赫立德校长的专属住房。校园的主体建筑彼此连接为一体，形成了独立的内向性封闭院落（图 4，5）。

## 1.2 赫立德对校园建设的贡献

新学书院校园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是伦敦会传教士贝里循 (Thomas Bryson)。他于 1870 年代来华，先后工作于上海和武昌，1885 年调至天津。他是伦敦会在华传教士中唯一受过建筑师训练的，在庚子事变后负责了新学书院部分校舍的修复与重建工作，学校对面的伦敦会小教堂亦由其设计<sup>[3]</sup>。然而，史料中的种种迹象也表明，新学书院校园在设计理念上更多是出自首任校长赫立德的想法。在中国城市近代化发展的初期，由于本土职业建筑师缺位、办学经费筹措不易，在学校任职的西方教士有时会在其本职的教育工作之外兼任部分的校舍设计工作<sup>4)</sup>。伦敦会在天津办学时也面临相似处境，而同期来津的赫立德也对校园建设展现了很高热情。

赫立德是通才型的高学历传教士，拥有很高的科学与艺术文化素养。他拥有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文科学士 (B.A) 与文科硕士学位 (M.A) 和伦敦大学的科学博士学位 (D.Sc)<sup>5)</sup>，来华前曾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任院士 (Fellow) 与物理学讲师 (Physics Lecturer)，对音乐和建筑也有所涉猎<sup>[4-5]</sup>。在接手天津的办学工作后，他自费资助了早期校舍的改建费用，亲自设计校舍并绘制草图<sup>6)[2][18]</sup>，并在校舍落成前差人制作了校园模型，在 1908 年分别展于校内举办的“东方的伦敦”展览会和英国本土由英法两国合办的东方研究会，以进行宣传 and 募捐<sup>[6]</sup>。除了通过海外募捐与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的部分退款来募集建校资金，赫氏也赢得了如袁世凯、梁如浩、梁炎卿等部分国内官僚富商的支持<sup>7)[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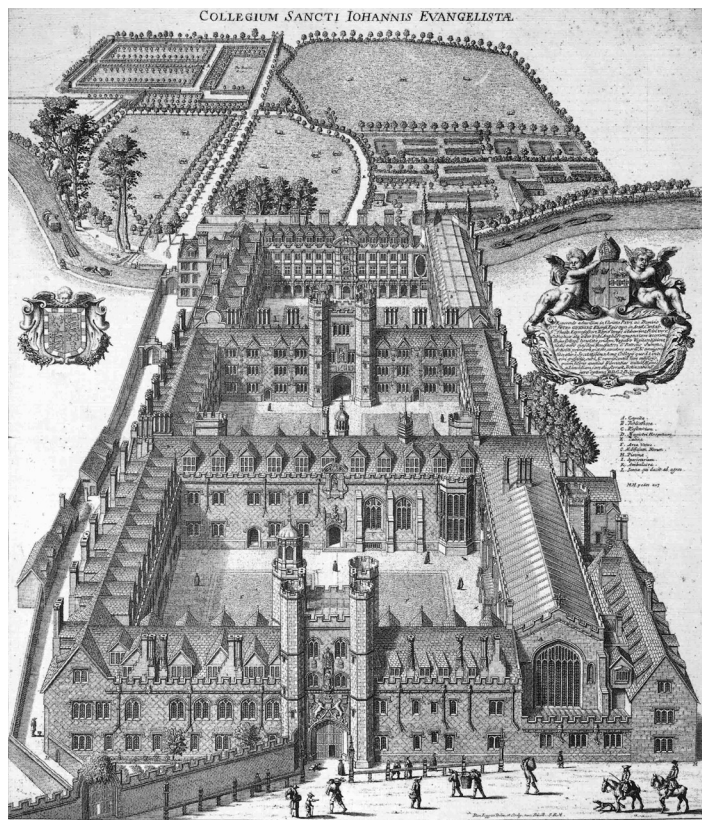
赫氏持续主持校务近 30 年，所有校舍工程均在其任期内完成。兼具学校出资者、募资者、管理者、设计者等多重身份，他拥有更

多落实自己校园设计理念的机会。赫氏对学校的教育定位是“一所提供高等教育的大学学院 (a general college for higher education)”。校园设计参考了他的母校——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该设想早在 1890 年代赫氏“期望 (扩建后的养正书院) 新校舍能再现其母校的一些特征”<sup>[2][18]</sup> 的时候已露端倪。在新学书院的后续落成校舍中也能看到这一设计理念的延续。

## 2 天津新学书院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规划思想比较

### 2.1 内向性封闭方院式的校园格局

在新学书院的华北博物院进门右侧的墙上，展有新学书院和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两校的照片<sup>8)[8]</sup>。剑桥大学的诸学院校舍主要沿着剑桥镇内的康河 (River Cam)、圣约翰街 (St John's St) — 特兰平顿街 (Trumpington St)、圣麦格达伦街 (Magdalene St) — 摄政街 (Regent St) 这 3 条南北向脉络排布生长，并与城镇建筑相互交织。赫氏就读的圣约翰学院始建于 1510 年代。学院以原基地内遗留的圣约翰医院及附属礼堂为北翼，建成主入口朝东、面向圣约翰街的封闭方院 (First Court)，容纳着大堂 (Hall)、礼拜堂、院长住房 (Master's Lodge)、图书馆、老师与学生的宿舍 (Chambers) 等功能<sup>[9]</sup>。截至 17 世纪后半叶前，学院自东向西朝康河方向增建了第二院 (Second Court) 和第三院 (Third Court)，形成了东临圣约翰大街、西抵康河、东西轴向的三进封闭方院<sup>9)</sup> (图 6)。20 世纪后，学院先于 1920 年代向西跨过康河增建了朝南的新院 (New Court)，后于 1960 年代拆除第一院的旧有北翼，在其原址向北平移的位置修建新礼拜堂，并扩



6 18 世纪初的剑桥圣约翰院校舍



大了第一院庭院的面阔。赫氏在圣约翰学院学习与工作时期,校园基本维持在这一格局<sup>[10]</sup>(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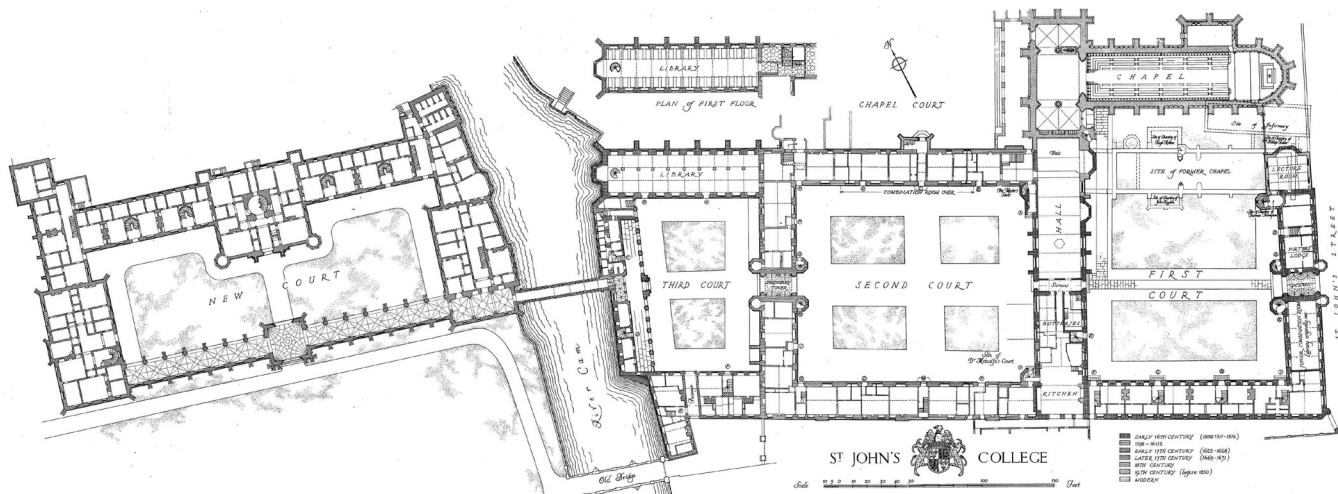
剑桥圣约翰学院的这种以“内向性封闭方院”为单位逐渐生长的模式,也是英国“牛桥”大学自14世纪起逐渐拥有自身专属建筑后一直延续的模式。学术界一般认为,该模式由中世纪隐修院基本模式衍生而来,综合考虑了维持宗教氛围、便于内部监管、防御外界侵扰、保证土地建设利用率等各方面因素,是对当时团体生活意识的建筑表达。历经数百年延续后,这种方院模式已成为英国大学校园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19世纪后半叶乃至20世纪初时依然受到很多英国校方与建筑师的认可。当时设计了多项“牛桥”大学校舍项目的英国知名建筑师沃伦(Edward Prioleau Warren)曾坚称,没人能找到一个在各个方面都比方院式布局(quadrangular plan)更适合于寄宿制大学的规划模式<sup>[10]</sup>。对于曾在剑桥圣约翰学院学习和工作长达14年之久的赫氏来说,这种封闭内向性方院式的校园空间无疑是他所熟悉的。在最初的养正书院扩建时期,赫氏的初步想法仅仅是“将圣经学堂和男童寄宿学校两座临街建筑连成一体,以赋予校园一个体面的前脸(a presentable front),使学校看上去更具竞争力”(图2)<sup>[2][20]</sup>。但随着学校办学目标的转变,校园有了新的扩建计划并最终建成了闭合的方院。可用地皮的局促面积与不规则边界,以及逐笔募款与分期建造模式的不确定性,使最终的方院空间更为灵活错动,庭院尺度也更趋紧凑(图8)。

天津新学书院大部分时期达到了300~700名学生的规模,原有的14.7亩的校园占地已十分紧张。在20世纪之交英法租界的新一轮扩张后,新学书院地皮已完全被纳入法租界内。地价攀升<sup>[11][11]</sup>和来自法国天主教的竞争导致沿周边扩充地皮变得十分困难。赫氏在任时曾先后试图在更偏远的张贵庄、墙子河沿地区增购1000至2000亩新地用于扩建校舍,但未能实现<sup>[12]</sup>。1937年学校曾计划购入学校北侧接壤的原北洋海军医院及医学校地皮来扩充校址<sup>[13]</sup>,但最终未果。此时赫氏已退休回国数年,学校也已专办中学,不再具备继续生长出“第二院”“第三院”的机遇了。新学书院校园直至被拆毁前始终维持在赫立德时期所奠定的单院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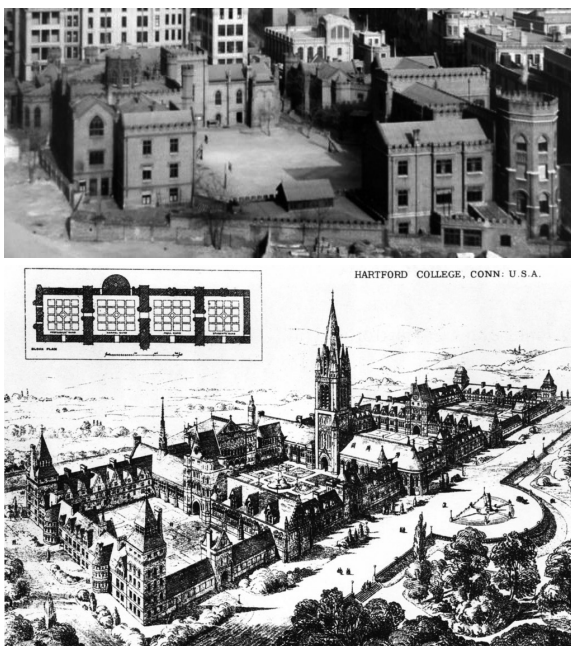
方院式结构与小规模渐进式的学校发展模式更契合。过高地预估学校发展进程而投入过量规模的建设,可能导致校园形态的失控。1870年代,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in Hartford)校长杰克逊(Reverend Abner Jackson)曾专程赴英物色建筑师,以期建成一所具有英国传统学院制特征的校园。被选中的伦敦建筑师博格思(William Burges)给出了4个串连的封闭方院形态的初始方案(图9)。该方案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结构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为一次性的蓝图式规划。尽管校方预见到该方案已超出了学校当时的实际需求,将方院缩减至3个,但在实际建设中仅完成了2个相邻方院的一侧,形成了一个超长的单体建筑<sup>[14]</sup>,与最初的理想相去甚远。

## 2.2 寄宿制传统下的校长专属住房与学生住宿单元

新学书院校园东南角落开辟了一栋2层楼房作为校长赫立德的住房。这种在校园内为校长开辟单独宽敞住所的做法,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赫氏的母校所属的“牛桥”大学寄宿制学院的规划传统。享有专属住房是“牛桥”学院院长的特权之一。1324年建立的剑桥迈克尔豪斯学堂(Michaelhouse)<sup>[12]</sup>的章程中即规定,应将最重要的房间分配给院长。建于16世纪初的剑桥基督学院(Christ's College)的章程中也要求,院长应享有其专用住房。略晚于基督学院且与之有着共同建立者的圣约翰学院也沿用了相似的做法。随着大学诸学院逐渐形成基本固定的规划模式,院长住房也被公认为其中的一项要素,需按照相应的比重给予分配。剑桥诸学院中最常见的布置方式,是将院长住房与学院大堂(Hall)内餐桌末端的位置相接,成为大堂的延续空间<sup>[9]vol.3 334</sup>。在1860年代以前,圣约翰学院院长的空间配置堪称奢华:占据着第一、二院相交一边靠北尽端的二层位置,南侧紧邻学院大堂,东侧留有专用通道通向(旧)礼拜堂,西侧连通第二院的方院北翼,并将整个北翼二层长达187英尺(约57m)的空间纳为院长专用的多功能长厅(Master's Gallery)。第二院内院东北顶角的位置设有一个带前厅的院长塔(Master's Tower)作为院长住房的专用楼梯间(图6,7)。在第一院格局于1860年代随新礼拜堂建设而调整后,院长住房迁至第三院北部的一座独栋2层小楼,楼



7 19世纪后半叶的剑桥圣约翰学院校舍平面



8 天津新学书院西南方向鸟瞰  
9 1870 年代美国哈特福德三一学院校园方案

前享有专属的大花园 (Master's Garden), 拥有可以欣赏学院图书馆、康河、叹息桥的良好视野。类似的, 在天津新学书院有限的地皮内, 校园东南首的赫立德校长住宅的南部也预留了不小的前院。校长住宅西面有 2 层通廊连至学院南楼, 住宅北面通向一座能俯瞰校园的塔楼 (图 4)。

在学生宿舍的组织模式上, 包括圣约翰学院在内的“牛桥”多数传统学院多设置联排并置的数组宿舍单元, 各单元内置专用楼梯并独立入户 (图 7)。至 19 世纪后半叶, 英国本土出现了用长走廊取代楼梯单元来组织宿舍房间的尝试, 应用到“牛桥”大学的某些新建的学院校舍中, 如牛津基布尔学院 (Keble College) 的利登院 (Liddon Quad) 和剑桥纽汉姆学院 (Newnham College) 的纽汉姆学堂 (Newnham Hall)<sup>[13]</sup>。前者的初衷是方便后勤管理者对宿舍人员实施监管。后者是出于对这所女子学院的女生的关怀, 使她们在相互往来时不必暴露于户外。天津新学书院的南楼学生宿舍, 以及近代时期中国多数大学宿舍, 均采用了这种改良后的“长走廊”模式。

### 3 天津新学书院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哥特建筑艺术

#### 3.1 哥特教堂建筑语汇与都铎府邸建筑语汇的拼合

哥特建筑艺术与大学校园建筑的结合, 自大学诞生之初就已经开始了。12—13 世纪初以来陆续建立的“牛桥”大学诸学院, 在数百年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哥特四方院为特征的基本校园风貌。截至 19 世纪末, 剑桥圣约翰学院最新和最老校舍的年纪相差达 300 年<sup>[14]</sup>, 其整体校园建筑风貌以 2 套哥特建筑形式语汇体系的拼合为核心特征: 一是以尖券窗洞口与扶壁尖塔为特征的哥特教堂建筑体系, 主要见于礼拜堂、大堂、图书馆等大型室内公共空间, 以及新院回廊 (cloister)、叹息桥 (bridge of sighs) 等半室外公共空间。一是以雉堞与角楼 (turret) 为特征的都铎府邸建筑体系, 主要见于第一、

二院的门楼与新院主楼。这 2 套体系也为新学书院所借鉴。

前一套语汇主要集中在新学书院校园中 2 处服务于宗教活动的空间: 一处在校园东侧临街的、原圣经学堂建筑塔楼以南的小礼堂, 每周周日校外教徒和少数校内学生都会来此处作大礼拜。另一处在北楼东翼的第二、三层通高的大礼堂, 每天上午 10:00—11:00 点的课间时段, 全校师生来此作小礼拜。这 2 处礼堂的外立面综合运用了尖券窗洞口、窗洞内细长比例的窗棂划分、花饰镂空窗格、向上退叠的扶壁柱、突破檐口的小尖塔等哥特教堂建筑元素以昭示其空间的宗教属性 (图 10a, 10b)。这与校内其他世俗性常规房间在外立面上开方形 (或拱券) 窗洞、无扶壁划分开间、顶层檐口用连续雉堞的处理存在明显差异。小礼堂在 20 世纪初期做了扩建, 在主厅的进深方向增加了一跨开间, 并在尽端两侧增加凸出的耳堂。扩建后的耳堂与尽端半圆殿不开窗洞, 仅在实墙上砌出装饰性的尖券廊图案 (图 11)。

后一套语汇赋予整座校园以统一的形象。校园东北角的图书馆所在的沿街门楼与校园北楼主塔的原型, 明显地指向剑桥圣约翰学院第一、二院的门楼与新院主楼 (图 2, 12)。其基本形式是在方形平面的 4 角 (或仅正面的 2 角) 各突出一个八边形角楼, 角楼内的旋转楼梯通往门房的各层, 底层留出通道。雉堞角楼在立面上高出, 角楼之间的底层通道位置做占满整个开间的都铎券。这种都铎门楼形制在 16 世纪流行于很多学院建筑和府邸建筑中, 在剑桥的王后学院 (Queen's College)、国王学院 (King's College)、基督学院中均有出现。学术界一般认为其原型源自 13—14 世纪英格兰肯特郡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大隐修院 (St Augustine's Abbey, Canterbury, Kent) 的门楼<sup>[15]</sup>。在大门两侧设置一对距离很近的雉堞角楼组成门楼的做法脱胎于中世纪城堡门楼, 是城垣防御体系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12 世纪中叶起开始出现在英格兰地区。随着战争方式进入热兵



10 a 圣约翰学院礼拜堂正厅外立面; b 天津新学书院小礼堂外立面  
11 从内院看扩建后的小礼堂立面  
12 剑桥圣约翰学院二院门





13 a 圣约翰学院新院主塔外立面(左); b 新学院北楼主塔外立面(右)



14 圣约翰学院新院主楼(左)与新学院北楼(右)内部空间平面示意

器阶段以及城堡建筑的衰落, 门楼的精神威慑意义已渐大于其实际防御意义。其形式本身所具有的标识性特征逐渐被人们所觉察, 出现在隐修院、学院、府邸大院建筑中的入口部分, 并具有了对外彰显财富与权威的内涵。圣约翰学院的新院<sup>[15]</sup>主楼在借鉴都铎门楼形制的基础上, 加宽了角楼的间距比例, 增设了居于中心的、有飞扶壁拱卫的小穹顶式采光塔(cupola), 并使之在立面上取代四隅的角楼形成唯一制高点。新学院北楼主塔继续套用了此形式(图13a、13b), 并将中部的凸肚窗(oriel window)、首层大门、顶层檐口的构图关系由前者的“竖断横”改为“横断竖”, 获得了更多的开窗面积。中央制高点的采光塔用八角雉堞塔楼造型, 与校园中其他几处雉堞塔楼形成更统一的效果。

新学院校舍的一些细部也能在剑桥圣约翰学院中找到原型。例如窗洞挡水檐(hoodmold)处理与圣约翰学院第一、二院建筑中的形式如出一辙。这种源于自罗马风时期的构造曾作为一种重要的装饰要素, 广泛地见于法、德、西班牙地区哥特建筑外立面的拱券上<sup>[16]</sup>, 在剑桥大学的许多学院建筑中也很常见<sup>[9]vol.3 554</sup>。

### 3.2 建筑形式语汇的合理性分析

细究新学院建筑的形式语汇与其背后的功能和结构间的关系, 其合理性较剑桥圣约翰学院相比在许多地方仍显不足。以新学院东楼小礼堂和圣约翰学院礼拜堂正厅的立面设计为例(图10a、10b)。后者底部矮墙与其上细长尖券窗洞的比例划分, 是其内部宗教性大空间的真实表达。而前者的内部实为上下2层隔开的空间, 礼堂仅占据二层的部分。为了使外立面的比例划分获得纵向的宗教升腾感, 首层房间的层高被牺牲。相应的, 为满足首层房间的采光需求, 外立面“下实上虚”的升腾效果也被首层开启的窗洞所削弱。另一处例子来自新学院北楼和圣约翰学院新院(图13a、13b)。后者的主楼与其两翼的内部空间并不连通, 彼此间是被分户墙互相隔开的独立单元, 主楼单元仅需一个不大的前厅通往中心的纵向交通核。而前者的主体部分与其两翼联通, 其主体内设置宽敞的中厅作为每层的交通枢纽, 以容纳从大礼堂和各层教室汇聚而来的师生。对比二者, 要实现外立面上高耸的中央塔楼造型, 圣约翰学院

新院主楼的“实心”结构要比新学院北楼主楼的“空心”结构更显合理(图14)。尽管存在种种技术层面的合理性问题, 但天津新学院仍旧凭借其哥特式的建筑造型成功地向外界宣示了自己的“剑桥血统”。

## 4 19世纪晚期以来“牛桥”校园传统在英语世界大学校园建设中的延续与扩散

### 4.1 对英国本土及英裔主体国家地区大学校园建设的影响

天津新学院的校园建设折射出19世纪晚期以来许多出身英语世界的学校管理者及建筑师在建设新大学时的一种倾向——通过赋予新校园以英国“牛桥”大学中古老学院的某些特征来使自身获得某种高贵血统与深厚文化底蕴。

在英国本土, 尽管近现代大学内涵与职能上的转变使校园设计面临着许多新问题, 但“宁静的庭院”和“爬有常春藤的雉堞塔楼”等传统要素依然受到很多建筑师与校方的认可。当时的英国知名建筑师尚普尼(Basil Champneys)、沃伦, 剑桥大学凯斯学院(Caius College)财务主管洛克(J. B. Lock)均认为, “传统校园中的方院式空间、入口门楼、大堂、教堂等内容是必不可少的”。时任英国建筑师学会主席也认为传统校园模型依然是好的<sup>[10]86</sup>。“牛桥”大学中的一些新建学院, 如牛津基布尔学院的利登院(Liddon Quad, 图15)和剑桥塞尔温学院(Selwyn College)的旧院(Old Court), 依旧在延续传统的哥特方院模式。新兴工业城市的大学和数百所次级学校在整个19世纪后半叶也不断地重复着对“牛桥”大学传统校园的模仿<sup>[10]88</sup>。当曼彻斯特市政府委托沃特豪斯(Alfred Waterhouse)为本市设计欧文斯学院<sup>[17]</sup>(Owens' College)时, 后者首先想到的方案仍旧是一组方院式的建筑群。校园沿牛津街一侧的建筑形式最终也如校方所想, “是那种学院建筑中的早期的哥特风格(Gothic of a collegiate and early type)”<sup>[10]87</sup>(图16)。有英国学者指出: 在传统大学中, 它们凭借进一步宣扬自身身份特征和增强新老校园间的统一性来维护自己的既有权威, 而并未对校园形式进行外界所期望的实验性设计探索。在新兴大学中, 它们以损失功能正当性为代价, 对传统校园形式进行模仿, 借此来争相让自己尽快获得受外界认可的大学地位<sup>[10]90</sup>。

在英国文化根基较深厚的北美、大洋洲<sup>[18]</sup>等地, 当地高校也纷纷尝试在其校园中引入“牛桥”大学传统校园的特征。在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的美国, 大学建筑设计与哥特复兴建筑艺术相结合, 广泛分布于美国以新英格兰地区和中北部地区为主的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级学校建筑中, 并逐渐弱化其宗教性而融合了很多教育建筑设计的特点, 得名“学院哥特”(Collegiate Gothic)<sup>[17]</sup>。“学院哥特”校园建筑理念还与20世纪初美国高等教育中抵制综合性大学、复兴“牛桥”学院价值理想的思潮相契合, 成为美国校园学院精神的表达。追求亲密的师生关系、注重学生文化素质与个性培养的学院制理想与小规模社区化的方院式校园空间, 受到当时部分美国教育家以及克拉姆(Ralph Adams Cram)、克劳德(Charles Zeller Klauder)等建筑师的推崇。后者认为“牛桥”大学中



15 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利登院



16 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牛津路沿街立面

围合的方院式结构能营造出分散式结构所没有的优美、安静的空间环境，且这种对比在美国大学的宿舍建筑群中最为突显<sup>[18]</sup>。1910年代罗格斯 (James Gamble Rogers) 设计的耶鲁大学哈克尼斯方院 (Harkness Quadrangle) 即是一例 (图 17)。但更多情况下，美国的学院哥特建筑不限于方院的形式。有的学院哥特建筑方院则更多地成为了美国宏大蓝图式校园规划中草陌广场 (Mall) 和布扎轴线秩序控制下的次级配角空间，如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芝加哥大学 (图 18)、杜克大学等。1890—1910 年代，在受保守的学院传统教育理念统治的普林斯顿大学，校方先后聘请了卡普和斯特沃森 (Cope & Stewardson)、克拉姆、克劳德等建筑师对校园进行了系列的改造和扩建，将校园建筑统一为哥特风格。1902 年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代表性地道出了许多美国高校建设“学院哥特”式校园建筑的深层诉求：“学院哥特式建筑的建造，让普林斯顿从此公开宣示了它自身的学术根源与血统……仅凭在校园建筑上引入牛津、剑桥的特征，就可以使普林斯顿的历史向前增加一千年，将每个人的想象力导向最早的英语民族学习的传统”<sup>[19]</sup>。



17 耶鲁大学哈克尼斯纪念方院  
18 芝加哥大学 1898 年校园方案

#### 4.2 对近代中国大学校园建设的影响

随着同期英美殖民者来华办学，英国的“牛桥”传统和美国的“学院哥特”也被植入到部分中国近代大学校园建设中。除了由英国伦敦会和“剑桥人”赫立德创办的天津新学书院之外，由美国监理会创办的东吴大学和美国南浸信会与北浸礼会创办的沪江大学也均属代表案例。后者与美国弗吉尼亚州颇有渊源<sup>[19]</sup>，其校舍从材料、色彩、形体组合、建筑元素与细部设计，都与美国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的里士满大学 (University of Richmond) 的早期校舍有着惊人相似。但总体看来，“牛桥”传统与“学院哥特”对中国近代大学校园建设的影响有限。除上述 3 校在校园的整体形式上采用了这种带有英美正统学术权威象征意味的形式外，如之江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其他部分的英美教会创办的大学，仅在校园中需要强调宗教属性的礼拜堂建筑单体上保留了哥特建筑形式。另有部分大学校园在某些特定建筑部分地吸取了哥特建筑元素或形体特征，如国立山西大学工科大楼、国立东北大学图书馆、之江大学经济学馆、通州潞河书院<sup>[20]</sup>的部分校舍等。

#### 5 结语

近代时期是中国大学的发初期，建成了大量具有多元文化并置与融合特征的大学生校园建筑群体。在它们之中，天津新学书院的校园规模不算宏大，设计师亦不算“职业”。但该校与英语世界最古老大学之一的剑桥大学颇具渊源。主持校政长达 30 年的“剑桥人”赫立德，凭借其决策者与设计者角色身份的重叠、对设计参照对象的熟悉、对学校发展的苦心筹划和经营，保证了新学书院校园的设计特色与建设质量，校舍本身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有关校园设计及建造过程中的诸多更深层面的细节亟待更进一步的史料挖掘和分析厘清。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任何校园遗产的物质实体终将消亡，但一座历史校园的社会文化价值不应随其物质实体的消亡而消逝。实体今已无存的天津新学书院正是其中的独特一员。■

#### 注释

1) 1919 年前，学校仿英国大学学制开设大学课程，建成了涵盖预科、中学、大学教育的高等学校。此后，伦敦会将学校大部抽离，与美国的美以美会、公理会、美北长老会合并组建燕京大学，学校原址改办中学。1929 年，在北京教育部注册并更名“新学中学”。1953 年，更名“天津市第十七中学”。1960 年，学校高中



部迁至贵州路原十二中学校址，更名“天津市第九十中学”。原址的十七中初中部在文革时期改办天津市无线电半工半读中学，其后复校。原新学书院老校舍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遭严重损害，于1980年代初拆除，在原址另建了新校舍。2004—2005年，新校舍在大沽路扩建工程中被拆除。2009年，十七中并入天津市第二十一中学。

2) 1920年代重建后称马大夫纪念医院。

3) 北楼的西翼部分在形式与层高上明显与其主体部分不同，疑似不在同期落成。

4) 如19世纪末先后在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堂前身)和上海南洋公学(国立交通大学上海学校前身)担任校长和院监的美以美会传教士兼教育家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曾亲自设计了前者的钟楼和后者的上院、中院等校舍建筑。

5) 英国大学的学士学位(Bachelor's Degree)分为荣誉资格(Honours，具体分为1<sup>st</sup>Class、2<sup>nd</sup>Class Upper Division、2<sup>nd</sup>Class Lower Division、3<sup>rd</sup>Class4级)和普通资格(Ordinary)2类。赫立德在剑桥的文科学士学位拥有自然科学专业(Natural Science Tripos)一等荣誉资格(1<sup>st</sup> Class in Honours)。他还被伦敦大学授予了物理学专业的大学奖章(University Medal for Physics)。

6)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王晓静教授在伦敦大学亚非研究中心(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档案馆中发现了赫立德本人在信件当中随手绘制的校舍建筑草图。

7) 袁世凯曾于1903年聘请赫立德为其长子的专门教师。新学书院主楼内的大礼堂命名为“宫保堂”，并挂有袁世凯全身像。

8) 墙上共展有3幅照片：依次为新学书院校园、赫立德肖像、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

9) 1520年代，第一院西南角位置增建了一个小的附属院落，主要用于厨房后勤功能。该院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学院向西扩建第二院时拆除。

10) 今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第二院北侧的新的礼拜院(Chapel Court)建于1942年。

11) 1920—1930年代，法租界是天津各租界中地价最高的，其每亩平均估价12000元，其他租界每亩平均估价：英8000元；日10000元；意7000元。

12) 该学院是剑桥继彼得豪斯学院(Peterhouse)之后建立的第2所寄宿制学校，1546年与国王学堂(King's Hall)合并组建为三一学院。

13) 前者建于1870年代，William Butterfield设计。后者建于1870—1910年代，Basil Champneys设计。

14) 建于16世纪的第一、二院整体保留着英国都铎时期宫殿府邸类的哥特建筑特征；建于17世纪的第三院受英格兰本土文艺复兴思潮影响，混合了古典建筑特征；建于19世纪前中叶的新院和第一院北翼的新礼拜堂采用了浪漫主义哥特复兴风格。

15) 建于1831年，Henry Hutchinson设计。

16) 包括国王学院、耶稣学院、基督学院、三一学院、王后学院、凯撒学院、莫德琳学院的部分建筑窗洞。

17) 即后来的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的旧院(Old Quad，1870年代—1900年代)。

18) 例如澳大利亚悉尼大学1850年代建造的主院(Main Quadrangle)。学校创办人温特沃斯(William Wentworth)早年曾在剑桥大学的麦格达伦学院(Magdalene College)和彼得豪斯学院学习。校园建筑师布莱克特(Edmund Blacket)直言其方案灵感来源于“牛桥”中世纪书院，最终学校的主院仅建成东翼和大堂。

19) 沪江大学主要创办者之一的美国浸礼会的西差会位于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城。沪江大学注册于弗吉尼亚州，1917年获得弗吉尼亚州政府许可颁发学士学位，许多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友好人士对沪江大学校园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20) 1889年由美国公理会创办，设4年制大学与3年制中学课程，1912年更名为华北协和大学。大学部于1919年迁出，与北京汇文大学合办燕京大学，原址改办中学。

参考文献

[1] 涂培元. 天津新学书院的形形色色[G]//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第24卷).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477.

[2] Marina Xiaojing Wang. The Best Method of Selecting and Training Native Preachers”：A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ological Institute in Tianjin (1863-1902)[G]. Sino-Christian Studies,No. 23 (2017): 17. 转引自SOAS中LMS档案.

[3] In Remembrance: Rev. Thomas Bryson[J].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1936,12(Vol.69): 779-780.

[4] HOLLAND Arthur William. Oxford and Cambridge Year Book,1904(Cambridge Vol.2) [M]. London: Forgotten Books, 1904: 286.

[5] CULLEN A P. Lavington Hart of Tientsin[M]. London: The Livingstone Press, 1947: 9,10,17,19.

[6] 教育: 直隶新学书院之大扩充. 并州官报[N]. 1908(20): 13-14.

[7] 翁之熹. 我所知道的天津新学书院[G]//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第24卷).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472.

[8] Guide to the Tientsin Anglo-Chinese School Museum[Z]. 1900 :1.

[9] CLARK John Willis. The Architectural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and of the Colleges of Cambridge and Eton(vol.2)[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86: 239.

[10] LOWE R A, KNIGHT Rex. Building the Ivory Tower: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ollegiate Architecture[J].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Vol. 7,No. 2 1982: 85-86.

[11] 李天. 天津法租界城市发展研究(1861—1943)[D]. 天津：天津大学,2015: 54.

[12] 王勇则. 新学书院创办人赫立德[G]//天津市和平区政协,天津市和平区档案馆. 天津和平区老学校.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50-51.

[13] 天津商画报刊[N]. 1937.12(Vol. 23): 2.

[14] TURNER Paul Venable. Campus: An American Planning Tradition [M].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7: 220.

[15] GOODALL John. The English Gatehouse[J]. Architectural History, 2012, Vol. 55 (2012): 14,17.

[16] The Editors of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EB/OL].https://www.britannica.com/technology/hoodmold

[17] 冯刚, 吕博. 大学校园中学校院哥特风格建筑研究[J]. 建筑学报, 2016: 3.

[18] KLAUDER Charles Z, WISE Herbert C. College Architecture in America, and Its Par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mpus[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9: 33.

[19] WILSON W. Princeton University[J]. Princeton Alumni Weekly, 1902, (12):199-200.

图表来源

图1:作者改绘，原图https://www.ibiblio.org/chineseart/contents/atls/img/03.05.01.tientsin.jpg

图2:The Graphic[J]. Aug,11, 1900: 196.

图3、图10b:L.M.S. Guide to the Tientsin Anglo-Chinese Museum[Z].

图4、图5: 新学中学校一九三九班同学录，由天津近代史研究学者侯福志提供

图6:参考文献[13]：234.

图7:https://www.british-history.ac.uk/rchme/camps/pp187-202

图8:郑红彬.近代在华英国建筑师研究(1840—1949)[D].北京:清华大学，2014:265.

图9:Christopher Drew Armstrong.” Qui Transtulit Sustinet”：William Burges, Francis Kimball,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Hartford’s Trinity College[J].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2000(6),Vol. 59,No.2:195.

图10a:https://digital.library.cornell.edu/catalogss/3874146.jpg

图11:https://www.hpcbristol.net/visual/sb-s10

图12: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t\_John%27s\_College\_Second\_Court\_Cambridge,\_UK\_-\_Diliff.jpg

图13a:https://www.geograph.org.uk/photo/5970521

图13b:天津政协文史资料，由天津近代史研究学者张翔提供

图14:作者自绘

图15:https://www.ox.ac.uk/sites/files/oxford/styles/ow\_large\_feature/s3/field/field\_image/\_main/Keble.jpg?itok=gnZUhwBw

图16:http://www.victorianweb.org/art/architecture/waterhouse/18.jpg

图17:https://www.plymouthquarries.com/index.php/yale-university

图18:https://rockfound.rockarch.org/digital-library-listing/-/asset\_publisher/yYxpQfel4W8N/content/proposed-plan-for-the-university-of-chicago